



CONG XIANQU DAO FUNI

—ZHOUZUOREN SIXIANG
WENHUA XINTAI YANBIAN YANJIU

王美春◎著

从『先驱』到『附逆』

——周作人思想、文化心态衍变研究

四川大学出版社



CONG XIANQU DAO FUNI

—ZHOUZUOREN SIXIANG
WENHUA XINTAI YANBIAN YANJIU

王美春◎著

从 『先驱』到『附逆』

——周作人思想、文化心态衍变研究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 纯
责任校对:夏 宇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李 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先驱”到“附逆”:周作人思想、文化心态衍变研究 / 王美春著.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5614-5129-8

I. ①从… II. ①王… III. ①周作人(1885~1967)
—思想评论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52062 号

书名 从“先驱”到“附逆” ——周作人思想、文化心态衍变研究

著 者 王美春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5129-8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6.5
字 数 158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
联系。电 话: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邮 政 编 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www.scupress.com.cn



中文摘要

本书立足于中国现代文人周作人从“先驱”到“附逆”之心路历程，力图以一个综合性的立体结构来组织成篇：横向的结构上，通过对周作人文本的具体解读，通过周作人对兄弟亲情的无情疏离之考察，通过分析周作人深厚的日本文化情结，通过周作人抗战期间的实际言行，研究他成为“文化巨奸”的深层原因，解读他对自己失足的双面态度；纵向的结构上，希望通过对几个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历史事件之解析，考察、反思周作人在特殊时代、文化背景下具有的有别于中国正统的文人心态，包括思想立场、人文姿态等，在整个文化与文学转型的中国现代时期的意义呈现问题。

前言部分，对本书的研究对象“从‘先驱’到‘附逆’——周作人思想、文化心态衍变研究”作了简要界定，并简略分析了周作人所具有的文人心态——极端个人主义或为我主义，以及此种个人主义与中国古代“自由”的内涵与西方个人主义的渊源和复杂关系。通过对该论题近年来研究现状的梳理和分析，提出了本书的研究目标、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一章，从民间文化之复兴比国家兴亡更重要的思想之萌发、“和平的造成新秩序来”、成为社会主义的理论权威、开辟“自己的园地”这四个方面，具体分析了周作人五四前后所持的思想立场、文化心态。周作人这位“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曾

以个人主义为解构武器，深刻反思、批判中国传统的文学和文化思想；对于身处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种反思、批判精神是可贵的；个人主义是解构中国传统专制文化的一把利剑，但历史上的个人主义是在民族、国家范畴内发挥积极作用的，超出了这个范畴，则更多地表现出负面性。

第二章，从对骨肉亲情的背离、“不辩解”说、“相逢一笑泯恩仇”三个方面，具体阐述了“周氏兄弟”从“永不分家”到兄弟失和之间的思想转变。兄弟分手之后，两人各奔东西：一个成为荒漠中走来走去的斗士，一个躲进苦雨斋成为人间的看客。周作人其人、其文的格调大变，由先前的明快、朗然，逐渐变得灰涩、清冷，他宣称“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却是虚幻”。他以消极的方式入世，将思想内敛于生命体验中，漫谈古今中外野史杂著，走向一条不为他人轻易理解的道路。他躲入书斋，成为“苦雨翁”，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同时，也借当下经验叙述历史，逐渐远离了激进知识分子的溅血呐喊。

第三章，从以下五个方面：“从孔融到陶渊明的路”、“战士”之余风、“岂有豪情似旧时”、“我们永远是在于过渡时代”、“我是不相信群众的”，深入探讨了周作人从热血战士走向现代隐士的闲情出世之路。周作人这位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叛徒”，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渐转入自己的园地成为“隐士”，自称曰身披袈裟的方外人士，占据周作人思想核心的是个人本位的价值理念。

周作人逐渐成为唯理作家，以理性清明、性喜淡泊著称，作为五四启蒙运动的“先驱”，他在复杂、动荡的时代背景下，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激进的政治参与失败后，满怀孤独、绝望、宿命情绪，进入了20世纪30年代独力再造自由知识分子传统的精神探索期。

第四章，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周作人，其思想、文化心态

除具前述特征外，其日本文化观及其对日本独特感情亦独具特色，影响和左右了他一生的思想发展、人生荣辱。本章从如下四个方面：“知日派”作家、生成“东洋人的意识”、“去理解日本人的感情”、“中日文化共同体”的幻想，具体分析了这位宣称“日本的东西我什么都喜欢”的作家身上浓厚的日本文化情结，以及这种厚重的文化情结对周作人的人生荣辱和生命沉浮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五四以来，受西方进化论和启蒙思想的影响，一般人对社会发展持一种历史总是不断地向前发展的历史观，周作人对此持怀疑态度；因此，他虽然同情革命，但并未成为革命党，一直与革命保持着某种游离或距离。“新村”理想破灭后，他不再幻想大同，他信奉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使他退向幽深、封闭的自我环境，把眼光投向日本江户艺术，作为精神、理想寄托。深厚的日本文化情结，导致偏爱日本江户文化的周作人超越国界、民族，产生了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

第五章，曾宣称“愿做苏武去牧羊”的周作人，终于耐不住“流水斜阳太有情”的诱惑而执迷入俗；由于“过于爱惜自己的羽毛”，周作人终于不惜身家、名节，成为“文化巨奸”，在夹缝中卑微地活着；在这之间，周知堂“对于中华民族的负债”毫无疑问地将其置于民族罪人的境地。本章从历史的层面，具体分析了“文学之‘恶’”；同时，站在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角度，对周作人的“落水”作出深层次的思想、文化反思，并对其思想流变、心路历程作出总结。

第六章，1945年是周作人个人命运的转折点——从学者、名流、伪政府高官，到为身幽縲继的“文化汉奸”、“阶下囚”。面对“风雨如磐前路赊”的个人前途，周作人困惑至深，他为自己辩解曰“我不相信守节失节的话”。但是，不管怎么解释，他都曾经充当了日本“以华制华”的文化策略中的一颗棋子，这成

为他一生都洗不去的污点。

从“感时忧国”的文学正统看，周作人离弃了中国传统文学的基本立场——有风骨。从“文品与人品”的角度，按照“以存史迹，而分忠奸”的原则来考察，周作人的悲哀在于：当他被政治意识主宰了时，其文学意识便逐渐丧失了，最终成为人文分离的典型特例。

周作人从“先驱”到“附逆”的歧路中，伴随着他的思想巨变。对中国国民性之劣根性的绝望和领导抗战的国民政府当局的绝望，是他“附逆”的思想根源；深厚的日本文化情缘，民族虚无主义情结，“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人道主义”在现实中的生存本能，娶日本女子为妻和为自身盛名所累，受佛经影响认为“天下无真是非”，复兴民间文化比国家兴亡更重要的思想等多种合力成为其“附逆”的复杂动因。

本书认为，周作人从“先驱”到“附逆”之心路历程，既是周作人在传统与现代交合过程中无所依傍的矛盾悖论的复杂心态的表征，又是他对自己在国家抵御侵略和个人投降侵略者的矛盾生存处境的丰富体察与认知的结果，其中寄予了中国现代自由知识分子对历史、民族、国家的深刻绝望、无奈挣扎和现实背叛。

透过周作人从“先驱”到“附逆”的心路历程，可以体味到中国现代意识流变的过程，可以窥见中国现代文化接受史的侧面；文人的心态和价值取舍亦历历在目。周作人从“先驱”到“附逆”之心路历程所蕴涵的知识者精神历程和思想演进的复杂、矛盾、悖论与艰难，正是中国文化和文学在进行艰难的现代转型的精神印记。

前言

前

言



在日本人侵中国的民族危难之际，作为生命个体的中国现代文人是坚持爱国立场、恪守民族气节、与日伪势不两立，还是降敌失节、助纣为虐，不仅是作家个人品性的大是大非问题，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不应忽视的重要问题。抗日战争时期，周作人在沦陷区中国文坛的失足，是他本人的一个历史污点，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无需讳忌、混淆的事实。

从“先驱”到“附逆”——周作人思想、文化心态衍变研究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论题，作为对中国现代思想、文学、文化领域影响深远且毁誉不一的人物，周作人在历史、文化层面呈现出浓浓的悲剧意味，他内心深处的坚持与动摇、傲慢与惶惑、冷漠与趋时、睿识与浮浅、优雅与庸俗，对于探究人性和时代的复杂性很有必要。

本书希望立足于当时当地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文学现象，对周作人的思想、文化心态做一整体的文化反思，希望通过对周作人这个典型案例的个案研究，从文人个体的失足现象中追溯其落水的本质的心理渊源和文化渊源，借以纠正时下的一些不良文学、不良文化之风；同时，希望能从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分析学等角度，对抗战时期汉奸投敌现象发生的深层原因作出一定程度的考察和研究。

周作人参加日伪政府，是中国文化界的一件大事，曾引起文

坛震动。从“附逆”到受审，周作人的思考、辩解，种种言行，复杂心态，都具有文学史和文化史的特殊深远意义，值得深入研究。中国历史上这种现象和人物很多，如李陵、秦桧、钱谦益、吴梅村等；曾有人站在所谓的更高立场为他们辩解。但是，只要民族大义还在，大是大非就不会降为小是小非，也不会降为无所谓。不管是心甘情愿，还是委曲求全，事敌者都无法为自己开脱。

周作人一生以旁观者身份冷视俗世，留下诸多很有价值的文本，当他成为他人叙述的对象，话题之多也许只逊色于乃兄鲁迅。今天，窥视周作人这道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逐渐远去的景观，其身影不禁让人感慨不已。常言道：“文如其人”，但这毕竟是有些渺茫的。周作人一生的荣辱沉浮，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命姿态和思想流变，让他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文化史、文学史上最具悲剧色彩的人物。与传统文化丝缕相连的孤寂灵魂和功利主义、犬儒主义的生存态度，对文化信念的坚守和寂寞灵魂对生命的无奈悲叹，在历史狂流的冲刷之下显现出来。

周作人生活在社会变动、文化转型的时代，把他放在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中，来审视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心态，分析他自身的思想立场、文化性格对后来“附逆”的影响很有必要。面对时代变迁、生活沉浮，作家个体在无常善变的历史挤压中，文品和人品的双重要求下，人格缺陷被无情地暴露出来；这个负荷沉重、艰难跋涉在崎岖之路上的历史背影，终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一道让人唏嘘不已的苍凉风景。

这位曾高举自由、独立和人性大旗的思想、文化“先驱”，后来出现的思想、人格的分裂令人吃惊；周作人身上多色调的杂糅，是历史和人性复杂性、多样性的某种具体表现。我们一方面祈祷世界和平，另一方面也要吸取周作人的教训，使类似的惨况不致再发生。



理解周作人，不懂其内心的苦楚，似乎总是有些隔膜的。周作人的丰富性、复杂性和难读性，有时并不亚于鲁迅。所以，看待周作人，也应和理解鲁迅一样，不能以俗世的尺度简单丈量。一个知识分子在深刻与茫然之间，有时是游弋不定的，辉煌的背后也许正是大的虚空；周作人的著述生涯，终于也没能逃脱这样的宿命结局。这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漩涡。

因为祖父落狱、父亲早逝、弟弟早夭以及自己的多病，周作人很早就体会到人世之无常、生活之苦涩。在南京求学期间，他开始读佛经，佛教的世事无常等观点引起他的共鸣：“世界之有我矣，已 20 年矣；然 20 年以前无我也，20 年后亦无我也。则我之为我，亦仅如轻尘栖弱草，弹指终归寂灭耳。”^① 人生无常，短暂的一生中还要忍受强权、专制、礼教的压迫，这使周作人深感人世的可悲可悯，人生观随之变化：“昔主强权，今主悲悯，昔主欧化，今主国粹”，“世人吾昔觉其可恶，则今见其可悲，茫茫大陆荆蕙不齐，孰为猿鹤，孰为沙虫，要之皆可怜儿也。”^②

对人间悲苦的深刻体察，使周作人对凡俗人生充满着细微的感受和深刻的同情。对强权的反抗、对弱小的同情，使周作人认同喜爱大乘菩萨救世济人的弘愿。他曾多次表达自己的济世弘愿，但社会的黑暗、自我的渺小及民众的愚昧使他的心从明朗变得晦暗；同时，对启蒙者进行的不讨好的思想革命的命运的洞察，也使他心中充满悲哀。

周作人再三歌颂中国几千年思想界中还是有三盏明灯——王充、李卓吾、俞理初，因为他们不承认权威，疾虚妄，重情理，这就是现代精神。他常说自己是一个“无信”的人，“我对于信仰，无论各宗各派，只有十分的羡慕，但是做信徒却不知怎的又

① 周作人. 秋草园日记甲叙 [A]. 周作人日记 [M]. 大象出版社, 1998.

② 周作人. 顽石日记 [A]. 周作人日记 [M]. 大象出版社, 1998.

觉得十分的烦难，或者可以说是因为没有这种天生的福分罢。”^①不过，这种“无信”不是虚无主义，而是认为一切存在都是暂时的、有限的、有条件的，没有永恒不变的真理，也没有绝对完美的主义。

因此，周作人推崇过文学救世，但也指出文学不是万能的；他热衷过“新村”理想，但也知道它过于看轻人性的某些弱点；他相信基督教“爱”的理想是好的，但又认为指望其教训的实现是痴人说梦；他喜欢读佛经，但又多次声称进不到佛教里去；他声称自己是儒家，却不屑与孔子的学徒为伍；他“觉得社会主义是现世唯一的出路”，却常有“故鬼重来之惧”^②；他对于一切好听的名词都不免怀疑，却也斥责否定一切的虚无论，他说自己不大能同情厌世家。既否定唯我独尊的独断主义，又拒绝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周作人说自己是一个中庸主义者。在他看来，中庸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固有精华，也是与古希腊文明相契合的优点所在，因此值得发扬和提倡。

总起来说，周作人的文艺思想，前后经历了三个阶段。从留学日本时主张文学救国，到新文化运动中倡导“人的文学”，这一阶段周作人的文艺主张和争取民族独立、个性解放的目标相一致，具有功利色彩。抗战时期，他担任伪职，提倡“伦理之自然化”、“道义之事功化”，主张文学成为“政治的一部分”，为“东亚共荣”的功利目标服务。在这两者之间，20世纪20年代初到30年代中期，则从倡导“人的文学”演进到“个性的文学”，从重视文学启蒙演变到认为文学无用，表现出强烈的非功利色彩，逐渐成为纯文艺思潮的代表。

周作人一直主张提倡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解构中国传统专

① 周作人。知堂文集·序 [A]。上海：天马书店，1933。

② 周作人。知堂文集·序 [A]。上海：天马书店，1933。



制文化的一把利器，但历史上的个人主义是在民族、国家范畴内发挥积极作用的，超出了这个范畴，则更多地表现出负面性。周作人说：“中国所缺少的，是彻底的个人主义”^①。所谓“彻底的个人主义”即“人间本位主义”的个人主义，也即强调个人优先于群体的个人主义。周作人引用马庆川之话说：“人类或社会本来是个人的总体，抽去了个人便空洞无物。……个人外的社会和社会外的个人都是不可想象的东西。”^②在他看来，个人是社会或人类的本源，人类或社会从根本上可归结为个人，他说的个人主义从根本上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

五四时期，个人被置于中心地位、首要地位，人的个性以及相应的权利等问题成为社会的中心问题，成为文学的中心问题。这时，周作人的个性主义思想已见端倪，但还只是“人的文学”这一思想综合体的因素之一，和人道主义的博爱精神既相联系又矛盾地扭结在一起。周作人一方面提倡“平民文学”，重视反映下层人民的生活和愿望，强调文学的普遍性和全民性；另一方面则强调自己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③

周作人强调“人的文学”就是个人主义的文学，他承认文学具有人类性，但这是建立在“人类是由个人组成的”这一前提基础之上的，“人类”在周作人这里实际上被个人化。他反对把文学纳入国家、种族和家庭的范畴，反对把文学当作实现国家、种族和家庭目的的工具，因为如果这样，个人主义在文学中就会受到伤害从而泯灭。在周作人那里，个人主义文学本质上是把个人从国家、种族和家庭中解放出来，而不是纳入其中。当然，周作

① 周作人. 艺术与生活 [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46.

② 周作人. 自己的园地 [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25.

③ 周作人. 艺术与生活 [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1.

人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在五四时期比较特殊，他自己称之为“彻底的个人主义”，实际上是极端个人主义。

强调人的个性与解放，强调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基本理念。但是，强调自由的个人性以及自由对于群体、国家的对立，即坚持西方原本意义上的自由主义精神和价值观，这只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国现代自由主义又把个人主义相反的内涵即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等包涵入内，并在独立、自主、自由的意义上将二者整合起来。也就是说，中国现代自由主义同时也重视群体，重视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与自由，并把它纳入自由主义的范畴。^①

中国自晚清以来，“救亡”一直是政治文化的基本主题之一，这深深地影响了一切西方思想形态，包括个人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运用。五四时期，中国思想文化最显著的特点是对中国传统社会制度以及思想文化的批判，西方个人主义作为这种批判的有效工具得到张扬，因而比较原本。五四时期的中国，自由主义更多地是在个人的层面上展开的；但随着个人解放色彩的淡化，民族矛盾的突出，革命思潮的高涨，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很快被纳入国家民族自由主义的范畴，个人主义被打上革命的烙印，个人的自由与权利逐渐让位于国家、民族的独立和自由。

五四时期中国所引入的西方个人主义主要是一种功利个人主义，其特点是突出强调个人的权利尤其是自由的权利，强调社会的最终价值只能通过个人的幸福和个性的自由发展来实现。就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而言，周作人的个人主义思想受英国功利自由主义和柏利的自由主义思想影响比较大，表现为个人至上的特点。作为一个提倡自由至上的思想者，周作人从事的“人的启

^① 高玉. “个人”与“国家”的整合——论中国现代文学“自由”话语的理论建构 [A]. 厦门大学学报: 哲社版 [J].



蒙”有重要意义；但这种启蒙只能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进行才有意义，超出此框架则走向迷途。

作为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周作人虽做了文化汉奸，但与那些纯搞政治投机、发国难财的政客汉奸有区别。因受其文学成就的感召，因其曾被日本文学报国会代表片冈铁兵评为“反动老作家”，因其曾保护、营救了一些人，周作人不同于普通汉奸。他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叛徒又是隐士，既是文人又是“督办”。这位闲情出世而又执迷入俗，让人难以评说的苦雨斋主人周作人，一面是和鲁迅齐名、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一面却是丧失气节、背叛国家的民族叛徒，可谓冰火两重天。

周作人在抗战时期“附逆”，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伪职，历时六年。这让他抗战结束后，成为被中国政府公审的“汉奸”，先被判刑14年，后改判为10年。这不仅是他个人一生的耻辱，也让中国文化和文学蒙受了重大损失。周作人的“附逆”，使人困惑，也让研究者为难，简单否定和过分肯定他都不合适，至今仍困扰着大家。

从国民党监狱走出的周作人，在新中国被剥夺政治权利。虽然，周作人的罪孽不能与汪精卫等人相比，但在“文人”投敌者当中，周作人却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且因其原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名望甚高，所以他叛国投敌所起的恶劣效应又非一般投敌的文人可比拟。^①本书希望能从文品和人品的角度，综合分析、系统阐述周作人其人、其文，反思其政治失足之遗憾，批评其行为、思想“落水”之深层根源。

周作人一生著作宏丰，在民俗学研究、儿童文学与民间文学

^① 吴江. 从胡适说到周作人 [A]. 炎黄春秋 [M]. 2000-06.

研究、希腊及日本文化研究等方面都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近年来学界对他的研究日渐重视，这是应该的。周作人有过也有功，他应被批判，但不应被忽视和忘却。借用鲁迅先生评价刘半农的话来说，应“以愤火照出他的功绩”来。

本书希望通过反思周作人从“先驱”到“附逆”之心路历程，感受那个时代粗粝的异态的生存时空，期望能为中国国民性和国民心理的再造与重塑提供一个切入点，希望能倡导一种对于生命的自觉承当精神和可以担起时代艰虞的认真负责的人生态度，这或许是本书的最大意义之所在。

“从‘先驱’到‘附逆’——周作人思想、文化心态衍变研究”这一论题，将中国现代作家周作人的人品、文品及其创作作品、文化立场、思想历程等都纳入研究视野，围绕这一相关主题，一大批相关的论文著作纷纷涌现，从不同层面做出了颇有价值的探索和考察。现就该论题研究现状做一下简略的梳理和分析：

第一，从中国现代作家个体生命层面，从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分析学的角度，对周作人所展现的复杂思想、文化心态作出研究或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涉及的研究文章，有胡有清的《二三十年代周作人文学思想论析》（南京：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2期）、张先飞的《从普遍的人道理想到个人的求胜意志——论20年代前期周作人“人学”观念的一个重要转变》（北京：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2期）、姚锡佩的《琐谈鲁迅家族风波——八道湾房产“议约”引出的话题》（北京：鲁迅研究月刊，1997年第12期）、陈益民的《“忠舍”佚诗与狱中的周作人》（北京：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3期）、罗兴萍的《试论周作人研究民俗文化的立场和态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年第3期）、日本学者尾崎文昭的《与陈独秀分道扬镳的周



作人——以一九二二年非基督教运动中的冲突为中心》，（日本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选粹，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7月版）、陈思和的《关于周作人的传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第3期）、董炳月的《周作人的附逆与文化观》（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2年第5期）等。

专著有孙郁的《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7月版），此书谈的是周作人与其朋友、弟子所构成的文人群体，兼记其写作、生活。舒芜的《周作人的是非功过》（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此书分上下两篇：上篇记述周作人的是非功过；下篇论析鲁迅、周作人兄弟关系的发展变化。还有钱理群的《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耿传明的《周作人的最后22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等。

第二，作家作品的横向比较研究。对中外作家，或同一时期、不同立场之作家，在抗战时期中国沦陷区的复杂思想、文化心态进行比较的论文，有丸川哲史的《日中战争的文化空间——周作人与竹内好》（开放时代，2006年第1期），在这篇论文中，身为日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学部学者的丸川哲史先生，选择了周作人与竹内好这两位站在各自国家、民族立场的人物作为媒介者，来探讨“日中战争的文化空间”这一论题。赵京华的《周作人与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年第2期），认为周作人一生与日本文化及其众多日本文人、思想家保持着深厚亲密的关系，作者就周作人与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两氏的思想文学交流作了考察。还有吴江的《从胡适说到周作人》（北京：炎黄春秋，2000年第6期），陈国恩、孙德高的《周作人与“江戸情趣”——兼与永井荷风比较》（武汉：武汉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等。

第三，从中国现代文学深受日本文学影响的角度，对中国现

代作家周作人的思想、文化心态作出研究或有所涉及的论文，有方长安的《中国近现代文学接受日本文学影响反思》（福建论坛 2005 年第 10 期），认为中国近现代文学主要是从文学转型、现代民族文学建构的现实问题出发看日本文学的，表现出急功近利的倾向；接受反传统的立场，社会革命化的接受视角，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日本近现代文学中那种急躁的“革命”情绪。刘伟、柴红梅的《日本文化情结与周作人的附逆》（济南：东岳论丛，2004 年第 6 期），文章认为在周作人的内心深处有一种日本文化情结，它与周作人的政治附逆存在着必然的逻辑关系。还有方长安的《形成、调整与质变——周作人“人的文学”观与日本文学的关系》（北京：文学评论，2004 年第 3 期）等。

第四，专门以思想、文化心态为主题，或是将思想、文化心态作为重要论题来研究作家作品的，数量众多而且涉及面也较为广泛。有孟庆澍的《从女子革命到克鲁泡特金——〈天义〉时期的周作人与无政府主义》（汕头：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 年第 1 期），认为 20 世纪初期流行一时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对周作人影响甚深；同时，周作人还对克鲁泡特金产生兴趣，为五四时期提出带有无政府色彩的新村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还有苏雪林的《周作人先生研究》（青年界，第 6 卷第 5 期，1934 年 12 月）、堵述初的《周作人与陶渊明》（艺风，第 4 卷第 4 期，1936 年 4 月）、哈迎飞的《从种业论到闭户读书论——周作人与佛教文化关系论之一》（北京：鲁迅研究月刊，2000 年第 2 期）等。

专著有王锡荣的《周作人生平疑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朱正的《周氏三兄弟——三兄弟的三种价值取向》（东方出版社，2003 年版）、刘绪源的《解读周作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 年 8 月版）等。

第五，从沦陷区文学研究方面对汉奸文化有所考察的论文，有张泉的《中国沦陷区文学研究的政治立场问题》（北京社会科